



社会保障研究
Social Security Studies
ISSN 1674-4802, CN 42-1792/F

《社会保障研究》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理论式微与治理转向:论新世纪以来西方贫困研究的“贫困”
作者：杨立雄，魏珍
网络首发日期：2023-10-19
引用格式：杨立雄，魏珍. 理论式微与治理转向:论新世纪以来西方贫困研究的“贫困”
[J/OL]. 社会保障研究. <https://link.cnki.net/urlid/42.1792.F.20231018.1048.002>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理论式微与治理转向：论新世纪以来西方贫困研究的“贫困”^{*}

杨立雄 魏 珍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1998年,阿玛蒂亚·森因在贫困理论研究上的贡献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后,围绕权利方法和能力理论,西方学者争论不断,发展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社会工作等学科亦在贫困理论研究上取得一定进展。贫困线研究、反贫困行动研究、参与式贫困研究和随机对照实验推动了西方贫困研究的治理转向和范式转型。2019年,该奖项再次授予研究减贫问题的学者。以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为切入点,通过对西方贫困研究的系统性梳理和反思,发现理论建构式微和方法论上的技术主义倾向导致西方贫困研究自身在21世纪陷入“贫困”。面向未来,反贫困依然是贫困研究的重点,我国亦应继续加强反贫困理论体系提炼和国际对话。

关键词:西方贫困研究;理论式微;治理转向;诺贝尔经济学奖

一、问题的提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步入“丰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但在“另一个美国”,贫困却发展成一种制度,一种文化和一种生活方式^[1]。如何解释并缓解“丰裕中的贫困”以及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的贫困问题?西方贫困和反贫困研究迎来“百家争鸣”。关于贫困成因,发展经济学将目光投向国家和区域层面,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以及临界最小努力等理论;社会学则将目光聚焦于个体、家庭与社会结构,提出贫困文化、贫困情境、社会排斥等多种理论解释^[2]。反贫困研究亦在理论、数据和方法上迎来质的飞跃,并出现“第二次贫困启蒙(the Second Poverty Enlightenment)”^[3]。由此,西方贫困研究在20世纪中后期进入理论繁荣期,并催生了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下文简称森)这一首位因研究贫困问题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作为“理论、概念、公理、测算以及实证的综合”^[4],森的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为后续贫困研究提供了新方向。

此后,西方贫困研究产生分野:部分学者围绕“权利方法”和“能力理论”产生诸多争论并丰富了森的贫困理论“大厦”;与此同时,面对全球仍有数十亿人生活于极端贫困的严峻现实,学者们将目光投向减贫研究,反贫困随机对照实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s)开始兴起。2003年,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成立,RCTs在此后20多年间得以广泛应用于教育、农业、健康及劳动力市场等领域,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主导性研究方法。2019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这三位研究减贫问题的学者,以表彰他们“以实验性方法减轻全球贫困”。

尽管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均授予研究贫困问题的学者,但森以建构贫困理论著称,班纳吉等人则因反贫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残疾人家庭与社会支持机制建设及案例库建设”(基金号:17ZDA116)阶段性成果。

困实验闻名,两次诺贝尔奖揭示出西方贫困研究的不同方向。那么,这种转向因何发生、如何发生,西方贫困研究未来将走向何方,中国贫困研究能从中得到何种启示?这是本文旨在回答的几个关键问题。

二、争议中前行:森获奖以来的西方贫困理论研究

在森获奖后,他的思想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史蒂夫·普雷斯曼(Steven Pressman)和盖尔·萨默菲尔德(Gale Summerfield)将其贡献归纳为:对传统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哲学批判与伦理复兴,试图构建基于权利和可行能力的“现实世界”的经济学,以及对福利经济学中贫困与不平等、饥荒和性别议题所做的理论性阐释^[5]。与此同时,森在不平等、贫困和饥荒等领域的开创性研究不仅突破了传统的贫困定义,还贡献出影响至今的权利贫困和可行能力理论,同时也引发了公众对于“社会最贫困成员”所处困境的极大关注^[6]。但森的获奖亦引发了争议,有评论人士抱怨称这一奖项被授予了一个观点混乱的左派建制派(establishment leftist),且不过是瑞典皇家科学院对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选人不当的一种“赎罪”行为^[7]。此后,西方学者围绕森的贫困理论争论不断,并对该理论进行拓展和完善。

(一)对权利方法与能力理论的争论与完善

一方面是关于权利方法能否成为分析饥荒的合意切入点。在研究饥荒成因时,森开创性地提出了权利方法,认为粮食供给短缺只能有限解释饥荒因何发生,交换权利下降即食物分配关系的变化才是对饥荒更有力的解释。此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不仅涉及粮食短缺和饥饿,亦涉及与社会如何分配资源有关的法律、伦理和道德问题。此外,权利方法厘清了应对饥荒的传统政策误区,同时这一对饥荒成因的结构性、制度性和历史性解释也使人们对饥荒的理解更加深刻^[8]。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斯蒂芬·德弗罗(Stephen Devereux)指出,权利方法忽视了饥荒发生的社会政治背景,并陷入了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因而并不足以成为分析饥荒的合意方法^[9];曲迪特·伊拉希(Qudrat-I Elahi)则认为,权利方法建构于一个明显不成立的假设即“资本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结构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是最优的”之上,同时“交换权利”思想隐含着某种法律义务,从而违背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自愿交换基础上这一常识^[10]。面对上述批评,奥利维尔·鲁宾(Olivier Rubin)指出,这是“一场打着学术辩论幌子、基于错误引用和不实陈述的诽谤”,并认为即便过去了30年,权利方法依然是分析饥荒的有效方法。但他也呼吁,在饥荒与冲突、法律崩坏和政治斗争等关联日益紧密的大背景下,须进一步从中观和宏观层面对饥荒进行补充分析,以便完善权利理论^[11]。随着时间推移,作为一种非马尔萨斯主义解释,权利方法展现出划时代意义:在越来越富裕的世界,饥饿和营养不良不断减少,饥荒的出现可归咎于社会分配未能保护部分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6]。

另一方面是关于可行能力操作化的应然性。20世纪80年代,森提出“可行能力(capability)”,将其定义为个体可实现的各种功能的集合,并认为贫困是对可行能力的剥夺。这一定义超越了以收入或物质资源为导向的贫困评估方法。同时,因以全面和综合的方式看待贫困、发展和社会正义问题并涵盖了人类福利的全部维度,可行能力理论成为评估贫困和不平等的新的规范性框架的基础^[12]。此外,由于创造性地将能力扩展作为发展的主要目标,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在处理发展问题时亦将可行能力理论作为的重要参考^[13]。但这一理论也引发了争议:对于“可行能力”操作化是否有必要?因操作化关涉价值判断且“能力”本身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森拒绝设定一个普适性的可行能力清单,并认为设置清单会否认公众有效参与的可能性^[14]。但英格丽德·罗比恩斯(Ingrid Robeyns)指出,森并未提供具有内在价值的能力清单,由此导致了能力理论的适用性受限,因而她提出了制定能力清单的4项准则:明确性、可论证性、普遍性和穷尽性^[15]。此外,清单的缺失亦会使可行能力不够完整甚至过于模糊,同时也会导致实践者和研究人员无所适从^[16]。针对上述质疑,森的拥趸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提出了一种多维能力正义理论,并列出了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核心能力”清单:长寿、身体健康、免于暴力、充分调动感官、情绪丰富、实践理性、有同理心且受到尊

重、博爱、享受娱乐、政治参与自由、物质充裕^[17]。

(二) 多学科视角下的贫困研究

贫困因其复杂性一直受到多个学科的关注,并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在经历 20 世纪中后期的理论繁荣后,西方贫困研究逐步归于平静。在森获奖后,发展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社会工作视域下的贫困研究再次迎来新热潮,并在理论层面取得一定进展。

1. 发展经济学:全球化时代的不平等与多维贫困研究

作为“穷国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自诞生伊始便关注贫困问题,并产生了诸多有影响力的理论。但由于缺乏微观基础,其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开出的药方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因而一度遭遇瓶颈。进入 21 世纪,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围绕“全球化背景下的贫困和不平等”,发展经济学展开了新一轮研究。在森看来,全球化丰富了世界的科技和文化,给人们带来了大量的机会和好处,但问题在于穷人能否从中获得公平的份额和机会。对此,需迫切改革那些剥夺穷人机会的制度安排^[18]。随后,马赛尔·纽特尔(Marcel Neutel)和阿尔马斯·赫什马蒂(Almas Heshmati)等构建了一个由“经济一体化、个人联系、技术联系、政治参与”四个分项指数构成的全球化指数,发现全球化能够显著降低贫困和收入差距^[19];安·哈瑞森(Ann Harrison)和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cMillan)探讨了全球化和贫困之间的联系,发现若配套政策到位,穷人更可能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但金融危机对穷人而言代价高昂,从而有必要为穷人设计更有针对性的社会安全网^[20];弗朗西斯科·费雷拉(Francisco Ferreira)和马丁·瑞沃林(Martin Ravallion)发现中低收入国家存在一个“增长—贫困—不平等”三角,即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力取决于不平等,因而减贫需要经济增长、亲贫式增长(pro-poor growth)和缩小不平等的共同作用^[21];201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则率先使用发展中国家的家庭调查数据(特别是消费数据)来衡量生活水平和贫困程度,从而将发展经济学从一个基于汇总数据的理论领域转变为一个基于详细个人数据的实证领域。

此外,作为贫困识别的新路径,近年来多维贫困成为发展经济学新的研究阵地并取得丰硕成果。在森看来,“人类的生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摧残和削弱,而首要任务……是承认不同类型的剥夺必须在一个总体框架内得到回应”^[22]。这一框架的核心便是可行能力,它将发展重点从物质财富的积累转移到人的能力的提升,并将发展经济学的重点从扩大物质消费转向提高人民的整体福祉。由此,多维贫困研究迎来热潮。在测量层面,萨宾娜·阿基尔(Sabina Alkire)和福斯特(James Foster)提出了计算多维贫困指数的“双临界值法”(A-F 方法)^[23];邓肯·科恩(Decancq Koen)和玛利亚·卢戈(Maria Lugo)将多维贫困指数加权方法归纳为数据驱动加权、规范加权和混合加权三类^[24];此后,有学者进一步将常用的多维贫困测算方法归纳为以指示盘方法(Dashboard Approach)和综合指数方法为代表的宏观数据测算方法和以韦恩图、多元统计、模糊集及公理化方法为代表的微观数据测算方法^[25]。在应用层面,2007 年,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Oxford Poverty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itiative, OPHI)成立,提出包含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 3 个维度共计 10 个指标的全球多维贫困指数(GMPI),并将该指数应用于 104 个发展中国家的多维贫困状况评估及相关政策设计中^[26]。2021 年,OPHI 发布《全球多维贫困指数:揭示种族、种姓和性别的差异》,该报告显示,109 个样本国家中 21.7% 的人口面临严重的多维贫困,全球多维贫困指数在种族、种姓和性别上的差距显著,新冠肺炎疫情更加剧了这一不平等^[27]。

2. 社会学:贫困新类型、代际贫困与性别贫困研究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西方学者有关贫困的社会学解释出现了结构和文化的对立^[28]。进入 21 世纪,社会学视域下的贫困测量及其类型学研究均取得新进展:大卫·布雷迪(David Brady)提出了一种综合测度历史变化、税收、转移支付、福利国家影响以及不平等状况,且将贫困概念化为社会排斥的“理想贫困测度方法”,并提出了区间测度、序数测度和序数总和测度 3 种可供选择的贫困指数^[29]。基于韦伯的理想类型学,

法国学者塞格·鲍甘(Serge Paugam)提出了“融入型贫困(integrated poverty)、边缘型贫困(marginal poverty)和失格型贫困(disqualifying poverty)”3种新的贫困形态,在进一步拓宽社会纽带理论的基础上,指出社会纽带的撕裂与瓦解是造成贫困和不平等的主要因素^[30]。与此同时,沿袭贫困文化研究传统,进入21世纪,代际贫困研究亦取得新进展:斯特恩·斯坦伯格(Sten-Ake Stenberg)将对代际贫困的解释从贫困文化视角扩展到福利政策和经济结构视角^[31];大卫·修姆(David Hulme)等运用110个国家的家庭调查数据,从传递过程、传递方式和传递内容出发构建了新的代际贫困分析框架^[32];亦有学者指出,由于资源和机会在整个社会的分配不平等,社会阶级和阶级再生产过程对于理解贫困尤其是贫困在几代人之间的延续依然重要^[33]。此后,围绕代际贫困的影响因素、测度方法以及阻断机制学界展开了诸多研究:影响因素主要表现为家庭结构、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和外部冲击等;在测度方面,除通过建立双对数模型来计算代际收入弹性外,亦有学者尝试通过“转换概率矩阵法”来测度子辈相对于父辈的经济状况变化;在阻断途径方面,学者们认为个体、家庭、社会和政府应当共同发力从而消除代际贫困^[34]。

此外,自20世纪70年代“贫困女性化”命题被提出后,性别与贫困引起社会学和女性主义研究者的极大关注。通过诠释“消失的女性”和“性别合作冲突”现象,能力理论有关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性别差异的解释为女性贫困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35]。英格丽德·罗比恩斯(Ingrid Robeyns)进一步从能力角度概念化和评估了西方社会的性别不平等^[36];西维亚·钱特(Sylvia Chant)总结指出,“贫困女性化”在概念和相关实证研究中存在过度关注收入和女性户主家庭以及忽视男性和两性关系等不足,并呼吁在制定性别贫困指数时应更关注底层女性,同时强调“责任和义务的女性化”,以提高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37]。此后,基于对贫困女性化的致因分析,贫困研究开始超越性别视角,关注贫困与种族、贫困与家庭结构等诸多问题。当前,“性别与贫困”议题虽在研究主题、测量方法、实证技术上有所进益,但其解释框架和所遵循的理论并未有大的突破。

3. 政治学:贫困研究复归、制度性贫困与反贫困新路径

从政治学视角理解贫困,就是把贫困放在权力关系背景下。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政治学将贫困视为一个政治问题,甚至有学者直接将贫困视为一种政治后果,认为政治使穷人陷入贫困^[38],亦有学者指出贫困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但传统的贫困研究却使贫困这一政治问题“去政治化(depoliticizing)”,因而呼吁贫困研究中的政治学回归^[39]。在探讨贫困成因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指出,尽管全球近50亿人从全球化中获益并摆脱极端贫困,但仍有“底层的10亿人”每天靠不到1美元悲惨生存,腐败、政治不稳定以及治理不力是造成这些国家陷入贫困和衰退的根源所在^[40];而无法为人民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护则是国家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政治地位的不平等进一步导致那些有损于穷人利益的政策得以推行^[41]。亦有学者发现,贫困是由个人特征和其所处的政治环境共同决定的,福利国家则是决定贫困的关键性因素,同时左翼政治制度的力量对贫困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42];此外,基于权力资源理论(Power Resources Theory),大卫·布雷迪(David Brady)进一步探讨了政治体制和政党制度对贫困和不平等的影响,他将贫困归结为由权力关系和有关资源分配的集体选择所驱动的结果,并发现国家通过调配资源、分散风险、人力资本投资、约束穷人以及规范社会期望等机制“塑造”贫困^[43]。

因此,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增长和政策干预路径,政治学研究者提出了“政治反贫困”和“权利反贫困”两条新路径。对于前者,有学者主张工人阶级、福利派与左翼政治势力在反贫困中联合^[44];亦有学者呼吁通过扭转“病态”的政党制度和改善地区民主来反贫困,并强调问责制、高效的官僚体制以及竞争性选举在反贫困中的重要功能^[45]。对于后者,多米内利·莉娜(Dominelli Lena)发现穷人面临物质、住房、政治表达和社会参与等多重“权利剥夺”,并遭受社会排斥,因而主张为穷人赋权,保障穷人在决策、政治参与、民主活动以及社会交往中充分享有公民权^[46];萨西亚·布莱克摩尔(Sansia Blackmore)则从制度主义理论出发,发现“政

治参与度的提高并不能遏制国家的掠夺行为”,且贫穷国家在出口和投资方面的“盈余”并不能消解其在为民赋权方面的“赤字”,因此建立民主政权并为穷人赋权才是解决贫困的根本出路^[47]。

4. 社会工作:新范式、多理论交织与实践新策略

福利国家建立后,作为反贫困社会政策的执行者,社会工作者被推向应对贫困的第一线^[48]。而在整个社会工作发展史中,贫困和穷人一直是其核心,社会工作者亦长期肩负增进穷人福祉的使命^[49]。奥康纳·艾丽斯(O'Connor Alice)将有关贫困的社会研究分为3大主题:贫困对儿童、妇女等不同群体的影响;反贫困项目或政策对低收入家庭及个人的影响;穷人的贫困体验及其应对贫困之道^[50]。此后,米卡·克鲁格-尼沃(Michal Krumer-Nevo)提出了“贫困意识社会工作范式”(Poverty-Aware Social Work Paradigm, PAP)。它是一种理论框架完整的贫困社会工作范式,由本体论(贫困是什么以及贫困人口的基本特征是什么)、认识论(我们如何了解和评估贫困的有关情况)和价值论(我们对贫困应该持有什么样的价值立场)这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构成。此外,从批判建构主义视角出发,PAP将贫困理解为经济资本和象征资本分配不均的结果,主张社会工作者奉行团结伦理,通过与穷人建立平衡的权力关系以对抗贫困,进而重塑有关贫困的社会正义价值观^[51]。施特弗勒·斯蒂芬(Stoeffler Stephen)则主张通过建构一个理论网络来指导贫困社会工作,并认为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反压迫社会工作理论(anti-oppressive social work theory)、习得性无助理论(learned helplessness theory)和希望理论(hope theory)相结合能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切入点^[52]。

在实践中,社会工作致力于减轻贫困和帮扶弱势及被压迫群体,在促进社会发展和提升个人福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改善欠发达国家的贫困状况做出了重要贡献^[53]。但有学者指出,社会工作仍存在未以符合其道德声明的方式投身反贫困^[54]、对贫困问题重视不够^[55]以及试图忽视反贫困斗争的复杂性^[56]等不足。为此,有研究主张社会工作者应直接参与反贫困工作,将平等参与原则置于其争取社会正义的核心位置,与贫困社区保持密切联系并共同关注贫困预防和向穷人赋权^[57],同时将情感支持、尊重、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归属感等被政策忽略的世界上最穷的人的价值观引入实践^[58]。与此同时,鉴于反贫困斗争的复杂性,亦应将政治目标纳入反贫困社会工作议程,具体策略包括:在现实生活中进行贫困干预、扮演穷人权利的倡导者以及穷人和官僚之间的协调者的角色、将微观实践与宏观社会政策相结合、站在穷人的立场上并直接加入他们的抵抗^[59]。费尔德曼·盖(Feldman Guy)则主张将关系性贫困理论(relational poverty theory)应用于社会工作实践,并提出四个实践原则:理解贫困的复杂性;将国家作为关键行动者;理解贫困关系时避免“新自由主义”倾向;反对个体化的贫困观和社会排斥^[49]。

除上述学科外,作为一个明确反映“国家—社会”关系性质和特定国家公民身份内容的领域^[60],与贫困有关的社会政策研究包括以可预见的方式影响贫困和社会正义的经济政策(如宏观经济政策和就业政策)、卫生和教育等社会投资政策以及面向穷人和其他风险敏感群体的现金转移支付等社会保护政策。学者们围绕上述政策展开了诸多研究,但由于并未触及贫困的结构性成因,上述政策在减轻贫困、不平等和社会排斥方面作用有限^[61]。此外,近年来,有关穷人情绪、压力和态度行为的研究成为新的热点,心理学视角下的贫困研究成果日益增多,测绘、地理等学科亦促进了贫困空间分布和反贫困政策研究的“技术化”。

(三) 西方贫困理论研究趋于式微

贫困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主题。围绕“贫困元问题、贫困发生学和贫困行动学”,西方贫困研究在20世纪中后期迎来理论繁荣期。在森获得诺贝尔奖后,关于贫困成因、贫困测量和贫困理论的研究均取得一定进展。但如上所述,虽然学者们长期致力于完善森的贫困理论“大厦”,却未能媲美甚至超越森的贫困理论,有的学者甚至沿着森的方向越走越窄,既缺乏明确命名的理论,亦缺乏学派间的理论辩论^[43]。可以说,西方贫困研究自身陷入了“贫困”。究其原因,主要是研究者更侧重对于贫困现象的描述性或规范性研究,缺乏解释性研究,同时相关研究非常分散且缺乏国际对话^[62]。

基于此,西方学者试图从不同学科视角入手寻求“突围”: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新自由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等学派均对解释贫困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脱胎于上述学派的贫困理论没有一种是完备的^[63];人类学擅于借助深入的民族志和参与式观察来记录和解释贫困人口的个人经历,并从文化的角度分析贫困,但在贫困理论建构方面贡献有限^[64];政治学视角下的贫困研究聚焦于新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下贫困成因分析、分配正义理论下政府在反贫困中的作用分析以及穷人的政治参与,但并未形成系统的贫困理论^[65]。此外,萨米提·麦吉德(Sameti Majid)等梳理了贫困成因、定义和测量理论,将解释贫困的理论归结为个人主义贫困观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和功能主义理论,文化贫困观下的贫困文化理论和机会理论,以及结构主义贫困观下的劳动力市场理论和社会排斥理论,并从货币、能力和社会排斥3个视角定义和测量贫困,此外,他认为上述研究的理论贡献寥寥^[66]。由此观之,尽管森获奖后西方贫困研究在多学科推动下不断深化,但在理论创新层面仍略显不足。

理论建构式微加之日益严峻的全球贫困现状,敦促学者们将研究着力点从相对抽象的理论探讨转向切实的减贫实践,以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问题”。作为一项世界性难题,反贫困具有悠久历史。在回溯“终结贫困(ending poverty)”思想的起源时,瑞沃林指出,直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美国发起“向贫困宣战”运动,这一思想才逐渐深入人心^[3]。进入20世纪90年代,社会资源日益丰富,终结贫困具备了更广泛的物质基础,建设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的呼声愈发强烈,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亦将反贫困作为其首要目标。与此同时,“每天1美元”国际贫困线的提出为贫困国际比较提供了基础,加之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国纷纷将其减贫方案与全球化紧密联系起来,并不再以孤立的和地方化的思维看待贫困问题^[67]。由此,研究者们再次将目光投向对反贫困行动路径的治理研究,西方贫困研究迎来治理转向。

三、治理转向:问题驱动下的西方反贫困研究

(一) 贫困线研究:争论与深化

反贫困的前提在于识别“谁是穷人”,相较于人口学定位和地理定位法,虽然贫困线易受到政治辩论和政策议程的影响而产生一定的误导性,但仍因具备客观性和可操作性而被广泛运用^[68]。长期以来,以预算标准法、马丁法、恩格尔系数法等成为计算绝对贫困线的主流方法。20世纪70年代,森提出了兼顾贫困发生率、贫困距和穷人收入分配的“森指数”。与此同时,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福利待遇使得发达国家转向对相对贫困问题的关注,相对贫困线研究迎来新契机。进入21世纪,贫困线研究继续在已有基础上不断深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相对贫困线的拓展与社会贫困线的提出。2001年,欧盟将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60%作为贫困门槛,由于以收入比例设定的相对贫困线具有单位弹性,因而被称为“强相对贫困线(strongly relative poverty line)”。此时,当国民收入以相同比例发生变动时,相对贫困发生率保持不变,这一反常特征使相对贫困指标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变动对人们生活水平的影响,同时也低估了穷人的营养和社会融入需求。基于此,马丁·瑞沃林(Martin Ravallion)和陈绍华提出了“弱相对贫困线(weakly relative poverty line)”概念,贫困线随着平均收入的增长而上升,但并非以成比例的方式上升^[69]。此后,迪恩·乔立夫(Dean Jolliffe)等在弱相对贫困线基础上提出了由国际贫困线、国民消费或国民收入分布共同确定的“社会贫困线(societal poverty line)”,并通过107个国家699条贫困线的回归分析,建构了社会贫困线函数^[70]。与弱相对贫困线相比,社会贫困线的时空覆盖面更广,且更能反映增长成果的分配状况。2018年,世界银行在《贫困与共享繁荣2018:拼出贫困的拼图》的报告中正式将社会贫困线纳入到全球贫困测量体系中^[71]。

二是主观贫困线测量方法的拓展。20世纪70年代中期,莱登贫困线(Leyden Poverty Line)和社会政策中心贫困线(Centre for Social Policy Poverty Line)等不同类型的主观贫困线问世,其测量方法则包括政治家

定义法、典型居民法、主观定义法、生存水平法和收入评价法^[72]。由于收入界定的模糊性,主观贫困线研究多以发达国家作为考察对象。进入 21 世纪,门诺·普拉丹(Menno Pradhan)和马丁·瑞沃林(Martin Ravallion)则首次将主观贫困线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发现可以通过对基于家计调查的穷人主观消费感知的定性评估来测算主观贫困线^[73]。此后,涅米次·克里斯蒂安(Niemietz Kristian)将主观贫困线分为“自我评估贫困线”和“多数主义贫困线”:前者没有参照标尺并由受访者自己设置标准;后者根据所有受访者集体同意的标准确定,具体是把大多数受访者认为自己贫穷的收入拐点当作贫困线或直接将他们认为维持本国最低体面生活的最低收入的均值设为贫困线^[74]。亦有学者用离散信息来估计主观贫困线,并将约登指数(Youden index)作为区分主观贫困家庭收入水平与非主观贫困家庭收入水平的分界点^[75]。

三是国际贫困线的争论与调整。由于预算标准法等贫困线计算方法通常局限于一国之内,1990 年,为比较各国贫困状况,世界银行提出了“1 天 1 美元”贫困线,该标准因便于理解和记忆,而被广泛用于不发达国家贫困研究。但这一提法也引发学者们质疑:桑杰·雷迪(Sanjay Reddy)等指出,“1 天 1 美元”武断且不可靠,纯粹是一个算术游戏,其掩盖了全球贫困的真实性,同时高估了拉丁美洲“穷人”的界定门槛^[76];帕潘斯·斯特凡诺斯(Papanastasiou Stefanos)认为“1 天 1 美元”并非科学意义上的绝对贫困门槛,而是一种营销工具,为世界各国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一个可接受但并不合意的标准^[77];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和奥利维尔·杜普(Olivier Dupriez)则指出“1 天 1 美元”虽然简单透明,却低估了全球贫困发生率且存在明显缺陷,通过对 62 个发展中国家的家庭调查,他们构建了穷人的购买力平价汇率(PPPps),并以此计算全球贫困发生率和贫困人口数量^[78]。此后,国际贫困线经历多次上调,2018 年,世界银行分别将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的贫困线调整为每天 1.91 美元、3.21 美元、5.48 美元和 21.97 美元,其中 1.91 美元/天是国际贫困线的通用标准。此外,亦有学者探索出新的国际贫困线门槛:周寻和迈克·卢布拉诺(Michel Lubrano)应用贝叶斯方法改进了国际贫困线估计方法,发现最贫穷国家的官方贫困线与平均消费水平相关,因而建议以 1.48 美元/天(基于 2005 年购买力平价)作为新的国际贫困线^[79];艾伦·罗伯特(Allen Robert)则提出了衡量全球贫困的“最低饮食成本法”,他在估计样本国家最低饮食成本的基础上得出一条高于世界银行的绝对贫困线,同时充分考虑穷人的住房支出和其他实际生活成本^[80]。

(二)反贫困行动研究:从千年发展目标到可持续发展目标

2000 年 9 月,联合国提出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其中首要目标是到 2015 年将全球贫困水平降低一半^[81]。MDGs 引发学术界长期争论:杰弗瑞·萨克斯(Jeffrey Sachs)指出,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有效的全球动员方案,千年发展目标有助于提高全球意识和公众的社会责任感^[82]。但由于在制定过程、结构、内容和执行方面均存在局限,MDGs 亦招致了广泛批评。派瑞克·邦德(Patrick Bond)指出,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产物,MDGs 的制定实质上由美国和世界银行等少数国家和国际组织主导,而作为政策作用对象的发展中国家则鲜有机会参与,因而该目标存在明显的“富国利益当道”倾向^[83];此外,MDGs 忽视了不平等和分配问题,其重点是促进全球一体化,而非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降低全球收入不平等程度,因而导致“平均主义暴政”(tyranny of averages),甚至加剧了全球不平等^[84]。因此,千年发展目标是一种“速效”而非可持续的全球治理结构性变革方案,加之缺乏问责制,能否如期实现引发了部分学者的担忧,有学者甚至认为 MDGs 的外部条件已被破坏,需要重建新的全球发展目标^[85]。

2015 年 9 月,联合国提出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它取代了千年发展目标并被用于指导全球发展工作,“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饥饿和减轻不平等”是该目标的重要内容。相较于 MDGs,SDGs 促进了跨部门的政策整合,但仅依靠政府和政府间组织自上而下的指导并不能解决全球贫困问题,还需广泛动员企业和民间组织参与到全球反贫困进程。而在实践中,由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未能对发达国家产生有力约束,加之传统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联合国减贫机制并没有在全球贫困治理

中最大化地发挥作用。2021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对SDGs的实现产生了灾难性影响,并使全球近1.2亿人口重新陷入贫困,约16亿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生计遭到威胁,首当其冲的是妇幼老残及难民等最弱势群体,同时疫情亦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86]。

(三) 田野与实验: 贫困研究方法的拓展

长期以来,研究者在定义贫困和制定贫困衡量标准过程中通常会忽视穷人自身对贫困的看法,导致贫困污名化问题普遍存在。而在实践中,由于世界银行长期推崇“涓滴效应”,加之以经济学家为主导的智囊团笃信数字化、模式化的贫困治理方案,忽视了欠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和偏好,其“结构调整计划”并未帮助欠发达国家摆脱贫困,甚至使这些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陷入负增长泥潭^[87]。基于此,发轫于19世纪末,由查理斯·布思(Charles Booth)在伦敦东区贫困调查中使用的参与式范式(participatory paradigm)在贫困研究中再次兴起,相关研究强调穷人的感受和生活经历^[88]。在此期间,世界银行贫困问题专家迪帕·纳拉扬(Deepa Narayan)及其团队创造出集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知识于一体的“参与式贫困评估法(Participatory Poverty Assessment, PPA)”,并从书斋走向田野,在《穷人的呼声》系列研究中直观呈现了60个国家的6万多名穷人的生活现实^[89]。参与式研究范式的复兴不仅引发了人们对穷人主观贫困体验的关注,相关研究亦对减轻贫困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

在迪帕·纳拉扬看来,“无力感”(powerless)和“无法发声”(voiceless)是贫困的核心特征,穷人在与雇主、市场、国家及非政府组织等机构的互动中处于弱势并缺乏选择和行动的自由^[90]。因此,她格外关注社会资本和赋权在反贫困中的作用。在对坦桑尼亚的研究中,她发现村庄社会关系和社会规范同时具有“资本”和“社会”属性,能使村民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并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从而显著提高其家庭收入^[91]。此外,由于机会和组织能力等方面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穷人很难获得公平的回报,因而必须对其赋权,只有为穷人提供维系其尊严所必需的经济机会和基本服务,方能使其有效和长效脱贫。成功的减贫策略必须从穷人的现实出发,在提升穷人组织能力的同时,支持那些能带领穷人发展的领导者^[92]。然而,PPA在技术、伦理、操作和方法论上均存在问题,主要表现为从微观层面收集的研究对象信息在被聚合到更高层次时可能会丢失和出现去情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问题,从而影响从中建构起的知识或政策的合法性^[93]。但也有学者将这一方法视为一个“集体游戏”,认为它为参与者提供了发声机会,并使组织者能够深入了解地方层面的权力不对称和经济依赖如何影响人们对贫困的看法^[94]。

与此同时,不同于定性研究为主的参与式贫困评估,20世纪90年代,以RCTs为代表的定量贫困评估开始在欠发达国家兴起,西方贫困研究掀起实验风向。保罗·格勒卫(Paul Glewwe)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等在肯尼亚开展一系列有关学校教育的随机对照实验,发现为儿童提供抗蛔虫药物使学校缺勤率下降了25%,这一发现为世界上6000万儿童带来了免费驱虫治疗^[95]。此后,RCTs的应用范围逐步拓展到健康、金融、劳动力市场及基层选举等诸多领域,惠及数亿贫困人口。研究者们将全球贫困问题分解成更小、更易于处理的主题并设计严格的实验,相关研究为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力指引,并对了解穷人心理动机及解释该群体“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能够激励“直面现实”和“问题导向”的微观研究,RCTs已成为21世纪发展经济学的主流方法,不仅为部分实验国家和地区的反贫困政策制定提供了有效指导,亦大幅提高了全球减贫能力。近年来,RCTs的适用领域不断拓宽,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实验设计上亦不断完善,为发展中国家设计成本最小化的减贫政策提供了有益思路。与此同时,在《贫穷的本质》一书中,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和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超越实验研究,提供了翔实的案例,并从中挖掘减轻贫困的可能策略。而面对关于外部有效性的质疑(即能否摆脱背景依赖并克服随机化偏差等因素),迪弗洛等通过“设计—实验—再设计—再实验”这一迭代过程来反复修正实地实验,并将实验与经济理论或模型相结合,实现了随机对照结果的大规模推广^[96]。

(四) 西方贫困研究并未找到新方向

长期以来,学者们从未停止探索如何终结贫困。进入 21 世纪,严峻的贫困形势及日益丰富的物质资源为反贫困研究提供了丰厚“土壤”:其一,从主题上看,围绕国际贫困线出现诸多争论,贫困线标准也在不断调整,主观贫困线出现新的测量方法,相对贫困线研究不断深化,并且研究者从中发展出社会贫困线。虽然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and 可持续发展目标引发争议,但仍推动了全球反贫困行动。其二,从方法上看,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研究者走向田野倾听穷人声音,案例研究、田野调查及行动研究等定性方法极大推动了参与式贫困研究。近年来在西方贫困研究中占据主导的则是以计量模型和数理推导为主的定量方法,具有代表性的是强调因果关系检验的随机对照实验。其三,从主体上看,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在国际贫困线的设定与调整、反贫困国际目标的制定与追踪方面成果颇丰,并为贫困国际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以 OPHI 和 J-PAL 为代表的学术机构成为多维贫困和随机对照实验研究的中坚力量,其拓宽贫困识别、测量的路径,助力全球反贫困事业。

RCTs 的大规模应用使西方反贫困研究迎来方法论革命,201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更为其赢得了全球层面的认可。此后,借助 RCTs 开展的贫困研究“井喷”。但实际上,该奖项却引发了诸多争议。针对获奖者,有学者指出,相较于学术贡献,其“象征性意味(symbolic significance)”更突出——班纳吉是少数非西方国家经济学诺奖得主之一,而迪弗洛则是该奖项设立以来第二位女性获奖者和最年轻的获奖者,但这极易导致贫困研究的功利主义和急于发表的不良风气^[97]。针对 RCTs 这一方法,批评主要集中于伦理困境^[98]、外部有效性^[99]、因果机制和理论框架^[100]方面。批评者认为,随机对照实验并非解决贫困或发展问题的“万应灵药”,其中,南希·卡特莱特(Nancy Cartwright)指出,被研究人员视为“黄金标准”的 RCTs 充其量只能产生一个价值有限的无偏估计,甚至在应用中出现了本末倒置,即先有实验方案而后才产生“研究问题”^[101]。综上,201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因其成果的普遍性和可靠性尚未得到广泛验证而被质疑获奖为时过早。此外,RCTs 并非由 3 位获奖者原创且具有鲜明的技术倾向,与诺贝尔经济学奖鼓励基础性理论突破或原创性知识贡献的初衷背道而驰^[102]。由此,“以工具之新掩盖思想之乏”的做法并未使陷入理论困境的西方贫困研究找到新的方向。

四、总结与展望:贫困研究未来出路在何方

(一) 贫困研究的未来走向

森获奖后,西方学者围绕其贫困理论争论不断。在争论过程中,研究者并未因森是诺奖得主而对其理论一味赞扬,不仅展现了强烈的学术批判和理论思辨意识,还在争论中厘清了权利方法的完善方向,提高了能力理论的适用性,使之作为多维贫困的理论基础能更好地指导后续反贫困研究。进入 21 世纪,西方贫困研究迎来治理转向,为贫困治理开出有效“药方”,惠及数十亿贫困人口,但跨学科、跨国界理论对话的不足却使其陷入定式和国家狭隘主义(national parochialism)^[43],理论创新不足亦使西方贫困研究本身陷入“贫困”。

未来的贫困研究应何去何从?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为贫困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面对“疫情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剧全球不平等”这一严峻现实,有机构预测,全球极端贫困人口至少需要 10 年才能从疫情冲击中恢复,其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和精英政治所合理化的性别、种族和财富不平等^[103]。面对疫情冲击,西方研究者迅速响应,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研究内容既包括宏观层面疫情对全球贫困的影响,亦包括微观层面疫情对穷人生活的冲击。其中,大卫·拉博德(David Laborde)和马丁·维尔(Martin Will)评估了新冠肺炎疫情对贫困、粮食不安全和饮食的影响,发现其造成的全球衰退程度比 2008 年金融危机更严重,并预计将有近 1.5 亿人陷入极端贫困和粮食危机,同时,疫情对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

率和贸易均会产生冲击,并会最终破坏全球反贫困能力^[104]。默罕穆德·布赫吉(Mohamed Buheji)则发现,疫情加剧了社会阶层间的差距,且对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相对贫困群体的冲击最大^[105]。从历史上看,大流行病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催化剂。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已得到控制,但它对人类社会的最终影响犹未可知,疫情能否成为改变人们贫困认知和孕育新理论的契机,仍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二) 构建中国式反贫困理论体系

理论式微使得西方贫困研究迎来治理转向,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使得全球新增极端贫困人口大幅增加。可以说,反贫困研究在当下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曾长期饱受贫困问题的困扰,贫困人口多、分布广,以及贫困程度深等特征导致国内贫困治理难度极大。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致力于消除贫困,并在逾百年的扶贫探索中借助基础广泛的经济改革以及政府主导的扶贫战略与政策,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06]。2021年,中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高达70%,并为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治理贡献出“中国方案”。

中国贫困研究已持续近半个世纪,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从主题上看,研究涵盖贫困类型、贫困识别、贫困成因、贫困治理、区域贫困、群体贫困等诸多方面。从方法上看,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借助CFPS、CHFS和CGSS等大型微观数据库和计量模型对贫困测度、分解、影响及作用机制等开展了实证研究,还有学者借助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等质性方法进行参与式贫困研究^[107]。而从理论层面看,在研究精准扶贫时,学者们突破政策内涵和执行维度,从理论维度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指出精准扶贫是一种“集权的复合治理”模式^[67]或由行政力量主导的“行政治理扶贫”模式,在兼具“逆科层化”和“再科层化”双重逻辑的同时实现了政府有效性和社会有效性的统一^[108];此外,作为一种“复杂政策”,中国的扶贫开发计划通过将“顶层设计”与“地方转译”相结合弥合了“决策一致性”和“需求在地性”之间的张力,从而更好发挥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并提升了贫困治理效能^[109]。然而,与贫困治理实践领域的巨大成就相比,我国学者在反贫困研究领域中的理论探索仍在一定程度上脱胎于既有理论框架,在话语体系上亦存在学术话语让位于行政话语的倾向。究其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扶贫开发、社会救助制度建立、精准扶贫、探索相对贫困长效机制以及推进共同富裕等标志性事件或提法的启发,国内贫困研究呈现出鲜明的实践而非理论导向。因此,身处“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国反贫困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解释力、对外传播力和国际影响力,需要学术界静下心来继续探索。

参考文献:

- [1] 迈克尔·哈林顿.另一个美国:美国的贫困[M].卜君,金如,张维,杨兢,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
- [2] 黄承伟,刘欣,周晶.鉴往知来:十八世纪以来国际贫困与反贫困理论评述[M].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
- [3] RAVALLION M. On the origins of the idea of ending poverty [EB/OL]. [2023-03-02]. https://www.nber.org/system/files/working_papers/w27808/w27808.pdf.
- [4] Arrow K, Amartya K. Sen's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Social Welfare [J]. 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9, 101 (2): 163-172.
- [5] PRESSMAN S, SUMMERFIELD G.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s of Amartya Sen [J].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0, 12 (1): 89-113.
- [6] PUNDARIK M, CHATTERJEE S. Unfashionable economics selected contributions of Amartya Sen: 1998 economics Nobel laureate [J]. New Zealand economic papers, 2000, 34 (1): 25-51.
- [7] RICHMAN S. Nobel prize committee got its economics wrong [J]. Human events, 1998, 54 (46): 10.
- [8] ALEMU G. Revisiting the entitlement approach to famine: taking a closer look at the supply factor—a critical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J]. Eastern Afric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review, 2007, 23 (2): 95-129.

- [9] DEVEREUX S. Sen's entitlement approach: critiques and counter-critiques [J].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2001, 29(3): 245-26.
- [10] ELAHI Q. Entitlement failure and deprivation: a critique of Sen's famine philosophy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6, 42(4): 541-558.
- [11] RUBIN O. *Contemporary famine analysis* [M]. Berlin: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6.
- [12] ROBEYNS I. The capability approach: a theoretical survey [J].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capabilities*, 2005, 6(1): 93-117.
- [13] FARAH N. Amartya Sen and the revival of ethical tradition in economics [J]. *Atlantic economic journal*, 2021, 49(4): 393-402.
- [14] SEN A. The economics of happiness and capability [J]. *Capabilities & happiness*, 2008, 20(3): 41-55.
- [15] ROBEYNS I. Selecting capabilities for quality of life measurement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5, 74(1): 191-215.
- [16] COMIM F. Operationalizing Sen's capability approach [C]. *Justice and Poverty: Examining Sen's Capability Approach Confer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17] NUSSBAUM M. Capabilities as fundamental entitlements: Sen and social justice [J]. *Feminist economics*, 2003(9): 33-59.
- [18] 赵春珍, 龚伟, 阿玛蒂亚·森. 论全球制度安排的改革 [J]. *国外理论动态*, 2002(6): 17-18.
- [19] NEUTEL M, HESHMATI A. Globalization, inequality and poverty relationships: a cross country evidence [EB/OL]. [2023-09-04]. <https://www.econstor.eu/bitstream/10419/33890/1/515785253.pdf>.
- [20] HARRISON A, MCMILLAN M. On the links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poverty [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2007, 5(1): 123-134.
- [21] FERREIRA F H, RAVALLION M. *Poverty and inequality: the global context* [M] // Wiemer S, Salverda N, Tim 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conomic inequ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22] Sen A. A decade of human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2000(1): 17-23.
- [23] ALKIRE S, JAMES F. 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1, 95(7): 476-487.
- [24] KOEN D, LUGO M. Weights in multidimensional indices of wellbeing: an overview [J]. *Econometric reviews*, 2013, 32(1): 7-34.
- [25] ALKIRE S, et al.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26] ALKIRE S, MARIA E. Acut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 new index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EB/OL]. [2023-09-11]. https://www.econstor.eu/bitstream/10419/48297/1/3_alkire.pdf.
- [27] UNDP, OPHI. *Global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2021: Unmasking disparities by ethnicity, caste and gender* [EB/OL]. [2023-09-11]. <https://hdr.undp.org/system/files/documents/2021mpireportenpdf.pdf>.
- [28] 周怡. 贫困研究: 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的对垒 [J]. *社会学研究*, 2002(3): 49-63.
- [29] BRADY D. Rethinking the sociological measurement of poverty [J]. *Social Forces*, 2003, 81(3): 715-751.
- [30] 柳静虹. 贫困社会学的反思与革新: 基于赛格·鲍甘的类型学与社会纽带视角 [J]. *社会政策研究*, 2020(1): 47-63.
- [31] STENBERG S. Inheritance of welfare reciprocity: an intergenerational study of social assistance reciprocity in postwar Sweden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0(1): 228-239.
- [32] HULME D, MOORE K, SHEPHERD A. Chronic poverty: meanings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s [EB/OL]. (2001-11) [2023-09-11]. https://www.academia.edu/download/46281559/Chronic_Poverty_Meanings_and_Analytical_20160606-5945-1de76t9.pdf.
- [33] SHILDRICK T, JESSICA R.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overty* [M]. York: 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 2015.
- [34] 刘新波, 文静, 刘轶芳. 贫困代际传递研究进展 [J]. *经济学动态*, 2019(8): 130-147.
- [35] DOUGLAS H. Gender, discrimination, and capability: insights from Amartya Sen [J]. *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 2002, 30(1): 137-154.

- [36] ROBEYNS I. Sen's capability approach and gender inequality: selecting relevant capabilities [J]. *Feminist economics*, 2003 (9):61-92.
- [37] CHANT S. Re-thinking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in relation to aggregate gender indices [J].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2006, 7(2):201-220.
- [38] BRADY D. *Rich democracies, poor people: how politics explain poverty*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39] JOHN H. Bringing politics back in to poverty analysis: why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relations matters more for policy on chronic poverty than measurement [EB/OL]. (2006-10-23) [2023-09-02]. https://www.trentu.ca/ids/documents/Q2_WP34_Harriss.pdf.
- [40] COLLIER P. *The bottom billion: why the poorest countries are failing 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41] 安格斯·迪顿. 逃离不平等: 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 [M]. 崔传刚,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
- [42] BRADY D, ANDREW S, JENNIFER M. Putting poverty in political context: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adult poverty across 18 affluent democracies [J]. *Social forces*, 2009, 88(1):271-299.
- [43] BRADY D. Theories of the causes of poverty [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19, 45:155-175.
- [44] BRADY D. The politics of poverty: lef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e welfare state, and poverty [J]. *Social forces*, 2003, 82(2):557-588.
- [45] ONALENNA S. *Poverty reduction and changing policy regimes in Botswana*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 [46] LENA D. *Reconceptualizing poverty in Europe: exclusion, marginality and absolute poverty reframed through participatory relational space* [M] // HELMUT G, SCHWEIGER G. *Absolute poverty in Europ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a hidden phenomenon*. Bristol: Policy Press, 2019.
- [47] BLACKMORE S, RENEÉ E. A sequence to reverse poverty: institutions, state capacity and human empowerment [EB/OL]. (2020-09) [2023-02-28]. https://www.up.ac.za/media/shared/61/WP/wp_2020_80.zp193640.pdf.
- [48] DOWLING M. *Social work and poverty: attitudes and actions* [M]. London: Routledge, 2019.
- [49] FELDMAN G. Towards a relational approach to poverty in social work: research and practice considerations [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019, 49(7):1705-1722.
- [50] O'CONNOR A. *Poverty knowledge: social science, social policy, and the poor in twentieth-century US history*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 [51] KRUMER-NEVO M. Poverty-aware social work: a paradigm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with people in poverty [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016, 46(6):1793-1808.
- [52] STOEFFLER W. Social work and poverty: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intersecting theories [J]. *social development issues*, 2019, 41(2):21-32.
- [53] TWIKIRIZE M, et al. *The role of social work in poverty reduction and the realization of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in Uganda* [M]. New York: Fountain Publishing, 2013.
- [54] GUPTA A, BLEWETT J. Involving services users in social work training on the reality of family poverty: a case study of a collaborative project [J]. *Social work education*, 2008, 27:459-473.
- [55] KRUMER-NEVO M. Poverty-aware social work: a paradigm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with people in poverty [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016, 46(6):1793-808.
- [56] BOONE K, ROETS G, ROOSE R. Social work, poverty and anti-poverty strategies: creating cultural forums [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018, 48(8):2381-2399.
- [57] MANTLE G, BACKWITH D. Poverty and social work [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010, 40(8):2380-2397.
- [58] JORDAN B. Social work and world poverty [J].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2008, 51(4):440-452.
- [59] KRUMER-NEVO M. Poverty and the political: wresting the political out of and into social work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 [J].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work,2017,20(6):811-822.
- [60] BUGRA A.Poverty and citizenship;an overview of the social-policy environment in republicanTurke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2007,39(1):33-52.
- [61] BIRDSALL N,SZÉKELY M.Bootstraps not band-aids:poverty,equity and social policy[EB/OL].(2003-02)[2023-09-11].
https://www.cgdev.org/sites/default/files/2766_file_cgd_wp024.pdf.
- [62] MATTHEW D,WESTERN B.Poverty in America;new directions and debates[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18,41(1):305-318.
- [63] DAVIS P,MIGUEL M.A review of the economic theories of poverty[R/OL].(2014-08-20)[2023-02-28].https://bura.brunel.ac.uk/bitstream/2438/10008/1/Fulltext.pdf.
- [64] FRERER K,ET AL.An anthropological view of poverty[J].Journal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2007,16(1-2):73-86.
- [65] LEHNING J.Political science perspectives onpoverty[J].Journal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2007,16(1-2):87-103.
- [66] MAJID S,ESFAHANI D,HAGHIGHI H.Theories of poverty;a comparative analysis[J].Arabian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eview(Kuwait Chapter),2012,1(6):45-56.
- [67] 吴高辉,岳经纶.贫困类型、贫困观念与反贫困结构的变迁——世界贫困史的视野[J].探索与争鸣,2023(8):39-58.
- [68] LADERCHI C,SAITH R,STEWART F.Does it matter that we do not agree on the definition of poverty;a comparison of four approaches[J].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2003,31(3):233-274.
- [69] RAVALLION M,CHEN S H.Weakly relative poverty[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11,93(4):1251-1261.
- [70] JOLLIFFE D,PRYDZ B.Societal poverty;a relative and relevant measure[J].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2021,35(1):180-206.
- [71] World Bank.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2018;Piecing together the poverty puzzle[EB/OL].(2018-11)[2023-09-12].
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poverty-and-shared-prosperity-2018.
- [72] FLIK J,BERNARD P.Subjective poverty line definitions[J].Economist-Netherlands,1991,139(3):311-330.
- [73] PRADHAN M,RAVALLION M.Measuring poverty using qualitative perceptions of consumption adequacy[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0,82(3):462-471.
- [74] KRISTIAN N.A new understanding of poverty:poverty measurement and policy implications[M].London: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2011.
- [75] TOMÁŠ ŽELINSKÝ.Estimating subjective poverty lines with discrete information[J].Economics letters,2020,196:109545.
- [76] REDDY S.Inter-country comparisons of income poverty based on a capability approach[C].Arguments for a Better World; Essays in Honor of Amartya Se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 [77] STEFANOS P.Absolute poverty and social protection in the EU;a cross-nationalcomparison[M]//GAISBAUER H,SCHWEIGER G.Absolute poverty in Europe: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a hidden phenomenon.Bristol:Policy Press,2019.
- [78] DEATON A,DUPRIEZ O.Purchasing power parity exchange rates for the global poor[J].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applied,2011,3(2):137-166.
- [79] ZHOU X,LUBRANO M.A Bayesian subjective poverty line,one dollar a day revisited[R/OL].(2013-02-05)[2023-09-02].
https://halshs.archives-ouvertes.fr/halshs-00793725/document.
- [80] ROBERT A.Absolute poverty;when necessity displaces desire[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7,107(12):3690-3721.
- [81] 联合国官方网站(中文版).问题与解答:什么是千年发展目标?[EB/OL].[2023-09-12].https://www.un.org/zh/aboutun/booklet/mdg1.shtml.
- [82] SACHS J.From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J].The lancet,2012,379(9832):2206-2221.
- [83] BOND P.Global governance campaigning and MDGs;from top-down to bottom-up anti-poverty work[J].Third world quarterly,

2006,27(2):339-354.

- [84] GORE C.The MDG paradigm, productive capacities and the future of poverty reduction[J].IDS bulletin,2010,41(1):70-79.
- [85] SUMNER A,CLAIRE M.Introduction—the MDGs and beyond:pro-poor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J].IDS Bulletin,2010,41(1):1-6.
- [86] JEFFREY S,et al.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2021:The Decade of action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1.
- [87] 李晓红.全球贫困治理中的国际制度分析——以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例[D].中国人民大学,2016.
- [88] 蒙克,路畅.死亡地图与贫困地图:早期工业化伦敦的数据可视化[J].装饰,2021(4):32-36.
- [89] 董筱丹,程瀚兰,崔惠玲.穷人眼中的通向幸福之路——《穷人的呼声》介评[J].管理世界,2005(10):166-167.
- [90] NARAYAN D.Poverty is powerlessness and voicelessness [EB/OL].(2000-01-01)[2023-09-02].<https://www.elibrary.imf.org/view/journals/022/0037/004/article-A006-en.xml>.
- [91] NARAYAN D, PRITCHETT L.Cents and sociability: household income and social capital in rural Tanzania[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99,47(4):871-897.
- [92] NARAYAN D.Empower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a sourcebook[R].Washington:World Bank Publications,2002.
- [93] GORDON C.Knowing poverty 2002: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articipatory research and policy[J].Experimental agriculture,2004,40(1):142-143.
- [94] ANSOMS A.NEGOTIATING ON POVERTY:A participatory poverty assessment simulation game[J].Simulation & gaming,2013,44(4):586-601.
- [95] GLEWWE P, KREMER M, MOULIN S.Textbooks and test scores:evidence from a prospective evaluation in Kenya[R/OL].(2000-11-07)[2023-09-13].<https://citeseerx.ist.psu.edu/document?repid=rep1&type=pdf&doi=d85c5fe292b7c725e53088b51473870933ef046a>.
- [96] DUFLO E, GLENNERSTER R, KREMER M.Using randomization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a toolkit [R/OL].(2006-12)[2023-09-13].https://www.nber.org/system/files/working_papers/t0333/t0333.pdf.
- [97] CHIARA L.Reflections on the 2019 Nobel memorial prize awarded to Banerjee, Duflo, and Kremer[J].Erasmus journal for philosophy and economics,2020,13(1):79-92.
- [98] HOFFMANN N.Involuntary experiments in former colonies: the case for a moratorium [J].World development,2020,127:104805.
- [99] NAGATSU M, JUDITH F.Two strands of field experiments in economics:a historical-methodological analysis[J].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2020,50(1):45-77.
- [100] LABROUSSE A.Not by technique alone:a methodological comparison of development analysis with Esther Duflo and Elinor Ostrom[J].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2016,12(2):277-303.
- [101] CARTWRIGHT N.Are RCTs the gold standard[J].Bio-societies,2007,2(1):11-20.
- [102] 罗必良.贫困 RCT 及其争议——201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简评[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1-8.
- [103] 香港乐施会.不平等病毒:籍由公平、公正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凝聚被新型冠状病毒撕裂的世界[EB/OL].(2021-01-23)[2023-09-02].<https://www.oxfam.org.cn/index.php?c=article&id=4079>.
- [104] LABORDE D, MARTIN W, VOS R.Impacts of covid-19 on global poverty, food security, and diets: insights from global model scenario analysis[J].Agricultural economics,2021,2(3):375-390.
- [105] BUHEJI M,et al.The extent of covid-19 pandemic socio-economic impact on global poverty:a global integrative multidisciplinary review[J].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2020,10(4):213-224.
- [106]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银行.中国减贫四十年:驱动力量、借鉴意义和未来政策方向[EB/OL].(2022-03-31)[2023-09-12].<https://www.cikd.org/ms/file/getimage/1516697201483554817>.
- [107] 古学斌,张和清,杨锡聪.地方国家、经济干预和农村贫困:一个中国西南村落的个案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4(2):79

- [108] 许汉泽,李小云.“行政治理扶贫”与反贫困的中国方案——回应吴新叶教授[J].探索与争鸣,2019(3):58-66+142.
- [109] 吕方,梅琳.“复杂政策”与国家治理——基于国家连片开发扶贫项目的讨论[J].社会学研究,2017,32(3):144-168+245.

Theoretical decline and governance transition: a study on "poverty" of western poverty research since the 21st century

YANG Lixiong WEI Zhen

Abstract: In 1998, Amartya Sen wa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for his research on poverty theory. After then, there have been continuous debates among the western scholars around the entitlement approach and capability theory, and theoretical progress has also been made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sociology, political science as well as social work. Poverty line research, anti-poverty behavior research, participatory poverty research, a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have promoted the governance shift and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of western poverty research. In 2019, the Nobe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was awarded to three scholars studying anti-poverty. Based on the two Nobel Prizes in Economic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and reflects on the western poverty research, and finds that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decline and the technicalism tendency in methodology lead the western poverty research itself to fall into "poverty" in the 21st century. In the future, anti-poverty is still the focus of poverty research, and China should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oretical refinement of anti-poverty theoretical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dialogue.

Key words: western poverty research, theoretical decline, governance transition, Nobe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责任编辑:H)